

人文地理学论丛

李旭旦 主编

REN WEN DILIXUE
LUNCONG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文地理学论丛

李旭旦 主编

25.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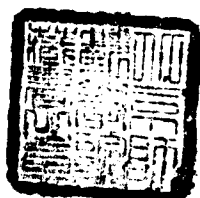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63544

人民教育出版社

1063544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教育部与中国地理学会共同举办的 1984 年暑期人文地理研究班的讲稿汇编。各篇文章均由专家撰写,全书介绍了人文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及经济地理、交通运输地理、人口地理、聚落地理、城市地理、政治地理、军事地理、社会地理、文化地理及旅游地理等主要分支学科,是目前较为全面、系统的人文地理学著作。

人文地理学论丛

李旭旦 主编

责任编辑 徐岩 石恺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3 字数 520,000

1985年2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书号7012·0913 定价 3.45 元

前言

人文地理学这门学科经过去四年多来的宣传与提倡,现已获得了地理学界的普遍重视,并已列为国家“六五”和“七五”计划中所必须加强研究的学科之一。为此,在中国地理学会下成立了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该委员会接受了教育部的委托,为在各大学地理系内设课而培养师资,于1984年暑假在北京举办了讲习班。本书即是汇集讲习班中人文地理学及其各分支学科的讲稿而编印的,书名暂定为《人文地理学论丛》,权充今后各校地理系讲义之用。由于讲解教师的业务修养及文字风格各有差异,学术观点也不尽相同,本书各讲的内容与规格不可能谋求一致。按“百家争鸣”与“百花齐放”的方针,进行学术讨论,对本学科的开展研究,不特无害,反将有益。因此,在编印过程中,基本上保留了原撰讲者的立论与观点,旨在求同存异而已。

我认为:人文地理学的宣传与提倡阶段现在已经过去,今后应从理论宣传工作进一步转入具体调查研究与写作的艰苦劳动阶段。初步考虑,至少有下列工作可做:

1. 出版人文地理学刊物,以为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提供切磋和交流的园地。这个刊物既可以刊登调查资料与研究成果,也可以报导和介绍一些国外有关人文地理学的信息。

2. 有计划地编写一套世界各国的区域人文地理学,以纠正过去介绍世界区域地理时过分偏重自然地理描述的偏差,冲破过去仅限于事实的记载与现象的罗列,而忽视社会经济问题的探讨与决策建议的论证等重要内容的作法,如日本人文地理学、英国人文地理学等既可作为地理知识来传授,也可以作为解决我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借鉴。

3. 有计划地编写一套人文地理学各分支系统分册,如都市地理学、人口地理学、政治地理学、民族地理学、社会文化地理学、农村聚落地理学等,充分论述各该分支学科的主要内容和论题及其与社会经济建设的关系,为人文地理科学各分支的进展奠定基础。

4. 调查研究国内各省市的区域人文地理,根据实际资料,编写综合性的或论题式的区域人文地理书籍,例如北京市人文地理、长江三角洲人文地理、珠江平原的人文地理,或云南省的民族地理、四川省的农村聚落地理、黑龙江省的政治地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社会文化地理等都可作为论题,既提供了中国区域地理的新信息,也可按各省市的区域性专题提出论点,采取决策,进行探讨,从事论证,来为各省、市、各专区、各特区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摸索道路,为决定方针政策提出良好的合理根据。

此书编辑过程中,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文奎、邬翊光、郭来喜三位同志大力协助整理,特此深表感谢。

李旭旦

1984年9月

目 录

前言

人文地理学引论·····	李旭旦(1)
人文地理学的马列主义基础·····	徐天芬(15)
中国人文地理学思想的发展·····	王成组(26)
人地关系论·····	李振泉(37)
人类生态学·····	江美球(46)
分工、交换和生产力布局·····	茅于軾(58)
经济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的主要分支·····	吴传钧(64)
国土整治的几个问题·····	陈 鹤(80)
关于能源开发利用的几个问题·····	邬翊光(91)
论我国交通运输的战略发展·····	张国伍(109)
人口地理学概观·····	王嗣均(117)
农村聚落地理·····	金其铭(126)
城市地理学·····	严重敏(144)
城市生态系统的特点、结构和功能·····	江美球(160)
政治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鲍觉民(187)
军事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	沈伟烈(191)
关于民族人口学与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析·····	张天路(202)
行为地理学的基本问题·····	张文奎(216)
行为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和意义·····	陈传康(230)
文化地理学与现代化建设·····	钱今昔(243)
人文地理模型·····	牛文元(250)
人文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旅游地理学·····	郭来喜(272)
中学阶段的人文地理教育·····	陈尔寿(287)
环境保护问题·····	王华东(301)
新技术革命与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新课题·····	张文奎(311)
世界各国人文地理学流派·····	李旭旦(320)
美国的地理学·····	杨吾扬(338)
日本人文地理学的发展·····	魏心镇(352)

人文地理学引论

南京师范大学 李旭旦

一、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

一般地说, 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的自然现象与人文现象的空间分布以及两者间的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长期以来, 地理学科总是被分成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大相互密切联系的组成部门。但近三十余年来, 我国一直按照五十年代苏联一部分地理学者的片面论述, 把地理学分裂成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两门各自独立的学科, 不特割裂了自然与人文现象的客观联系, 还把人文现象的研究局限于经济上的生产配置这一狭隘的范畴之内。苏联地理学界于六十年代展开了一场非常激烈的论战, 论战的结果是批判了过去把自然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分裂的错误, 提出了现代地理学应是统一的地理学的新观点; 并且认识到把非经济的社会现象排除在经济地理研究对象之外, 是不妥当的, 从而加强了重视社会化的倾向, 把原来的经济地理学扩大了研究内容, 并改称为社会经济地理学(等同于人文地理学), 把非经济方面的社会要素, 如社会文化、政治、历史、人口和聚落等的空间分布的描述与解释及其合理规划与分布等问题, 都作为其研究内容。八十年代的很多苏联地理学新秀, 明确主张社会经济地理的各个部门相互结合, 在一定的地区范围内综合地统一起来, 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有人称此为建设地理学。

至于在英、法、美、日等诸西方国家内, 人文地理是一直被重视的。在日本, 人文地理实际上就是大学地理系的主要课程。在英美各国, 近二十年来, 经过计量革命与结合社会福利的运动, 人文地理学已普遍地采用模型方法, 着重研究有关人民生活的问题。人文地理学正和新兴的环境科学、生态科学、区域科学与行为科学相结合, 力求在解决世界性资源短缺、人口危机、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平衡等重大社会问题上作出贡献, 从而促进了人文地理学在方向、内容与方法上的创新。

1980年以后, 我国多数地理学者也发出了要大力开展人文地理研究的呼吁, 要求加强这门已被长期忽视, 大部分已是十分薄弱甚至是空白的学科。目前在原有的经济地理、历史地理的研究基础上, 已经开始了人口地理、城市地理与旅游地理方面的工作。对政治地理、社会文化地理、民族地理、农村地理、行为地理等空白点, 也应逐步进行弥补或探索。

1982年在我国公布的第六个五年计划中已把人文地理列为要加强研究的薄弱学科之一。社会科学院及教育部的领导同志也一再提到过去被忽视的重要学科(其中包括人文地理)要积极恢复和加强。1981年5月中国地理学会在杭州举行了解放后的第一次人文地理学讨论会, 会上回顾了我国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历程, 介绍了国外人文地理研究的新动向, 设想今后我国开展人文地理研究的前景, 并为此成立了开展有关学术工作的筹备组。1983年5月又在南宁再次举行了

人文地理讨论会,会议强调了开展非经济方面的人文地理分支如政治地理、农村地理、民族地理、社会地理等的研究和应用计量方法的必要性。讨论中,代表们还认真学习了胡乔木同志于1983年2月在中央党校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他强调指出:“领导干部必须掌握文化知识课程,如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中国地理、世界地理、自然地理、人文地理都要知道。人文地理在苏联叫经济地理,但是,严格地说起来,人文地理要比经济地理的范围广泛得多,仅仅知道经济地理,我们的干部到什么地方去只考虑经济,对于其他的问题都没有兴趣,也没有知识。”这一讲话使代表们深受鼓舞和鞭策。会议一致建议在中国地理学会中成立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以促进工作的开展,并建议大学地理系内开设人文地理课程。1984年3月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会议接受教育部的建议,决定于1984年7月在北京开办人文地理学讲习班,为大学地理系开设人文地理课程创造条件。

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编委会为适应目前开展人文地理研究的需要,决定提前编写并出版人文地理学分册。早在1980年4月,即召开会议确定编写条目,聘定撰写人选。在四年余的时间内,聚集了国内有关专家的共同力量,对条目通过多次讨论与修改,并经反复审阅,终于完成了近三十万字的稿本,先行出版,以应当前之急需。由于三十五年来我国地理学界对这门学科中部分园地的荒弃,该书在内容上仍不得不偏重于经济地理部分,这是我国目前实际情况的反映;但它不失为我国目前唯一可供参考的比较全面的人文地理著作。

有人认为:近年来在我国,人文地理这门学科已经失传,经济地理学实际上已代替了人文地理学,从而主张把经济地理学的研究领域加以逐步扩展,把人口地理学、都市地理学、农村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社会文化地理学、民族地理学、旅游地理学等都包括在内,这样就没有重提复兴人文地理学这一学科的必要了。对此,我个人不敢苟同。我认为,这门学科之所以衰落与失散,是解放以来我国片面地学习当时苏联把地理学分裂为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的后果。六十年代,苏联已纠正了这个错误,而我们却仍然承袭着这一错误,不予改正,这是不妥的。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与教学在我国解放以前就已引入并存在,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也是一向被重视的。

近代科学分工日益精专,有些学科已仅存在一个名称。例如物理学,现在已没有一个人自称为全能的物理学家了。它早已分为力学、电学、热学、声学等,甚至更为细密。地理学也是如此,即以自然地理学而言,也已经没有人自称为全面的自然地理学家了;它已分为地貌学、气候学、土壤地理学、水文地理学、生物地理学等分支。单就其中的地貌学一个分支而言,现在又已进一步分为喀斯特地貌、冰川地貌、沙漠地貌,甚至泥石流地貌等专业。经济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关系和地貌学与自然地理学的关系一样,不论它的发展如何迅速膨大,它仍然是人文地理的一个分支。经济地理学不能囊括人文地理学,正如地貌学不能囊括自然地理学一样,这个道理是非常浅显的,事实上也是无法做到的。

恢复人文地理学这一学科,并不是要削弱经济地理学的发展。相反,它将有助于使经济地理在其合理范围内按照它的社会化方向,更为生动地开展。恢复人文地理学这一学科,有利于地理学这门学科的社会化,有利于这门学科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四化建设服务。

根据同样的理由,我们也不能因为近年来人文地理学的计量革命与技术化倾向,而把人文地

理学说成是数学或技术科学,这一点也应该是显而易见的。更何况分久必合已成为现代科学的新方向,科学研究除继续细密分工外,统一化、整体化、综合化的趋势正在抬头。

二、人文地理学的基础理论

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又称人生地理学。是以人地关系的理论为基础,探讨各种人文现象的分布、变化和扩散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空间结构的一门近代科学。人文地理着重研究地球表面的人类活动或人与环境的关系所形成的现象的分布与变化。它以人地关系论点作为理论基础的核心,而人地关系观点又是随着人类社会活动的进化而不断变化的。因此,要正确进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首先必须探讨人地关系观点的历史演变。

中国自古以来,对人地关系就有种种论点。战国时期(公元前 475~前 221)的《尚书·禹贡》中记载了古代九州的地理环境以及方域、土壤、物产田赋、交通等情况,可称为一部带有方志雏形的地理著作。《周易》(殷周战国时期)提出过“文明以止,人文也”的概念,并述及“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及“仰以观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和“俯则观法於地”等论点。先秦著作《礼记·王制》篇中指出了:“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这是带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而孟轲(约公元前 372~前 289)在《孟子·公孙丑下》中则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人定胜天思想。荀况(约公元前 313~前 238)则进一步提出了天人相关论,主张人类应“制天命而用之”。在他的《天论》篇中发表了:“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参”指人在对自然斗争中的努力)的精辟言论。管仲(公元前?~前 645)《地员》篇认为:“地者政之本也,辨于土而民可富”,已具有因地制宜的思想。东汉王充(公元 27~约 97)的《论衡·明雩》篇中说:“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时而应人”,主张人和地各有规律,反对人地关系的绝对化。北魏贾思勰(6 世纪)在他的《齐民要术·种谷第三》(约 533~544)中提出了:“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的说法,已具有人类对自然应该合理利用的思想。“因地制宜”四字虽是《隋书·经籍志》(656)才提出来的,但这种思想却早已为前人所重视。唐刘禹锡(772~842)主张人地相关论,认为:“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明末清初顾炎武(1613~1682)《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1631~1692)的《读史方輿纪要》都讨论了各地区的人地关系问题。《读史方輿纪要》虽然讲的是关山险隘,却一再强调了人定胜天的思想。清刘继庄(1648~1695)认为治学要解决实际问题及“天地之故”,即要求以人地关系的研究来分析问题。但在中国古代并无系统的人文地理著作,人文地理作为一学科是从西方引进的。

在西方,地理学一向把地球作为人类的家乡来研究。在古代的希腊、罗马直到伊斯兰教世界,如埃拉托色尼(Erathosthenes of Cyrene,约公元前 273~前 192)、斯特拉波(Strabo,约公元前 63~约公元 19)和伊德列西(Ibu Abdullah Muhammed ibn Idrisi, 1099~1164)等,曾有过不少人地关系的论述。但自进入中世纪黑暗时代后,神学代替了一切。直至 19 世纪后期,地理科学才开始形成地文、人文及区域三大分支。近代科学地理学的奠基人、德国的 A. 洪堡(Alexander Freiherr von Humboldt, 1769~1859)和 K. 李特尔(Karl Ritter, 1779~1859)

分别为地文和人文地理的研究开创了早期理论。

李特尔用经验法和比较法,研究世界各地各种地理现象的因果关系。在他的《地理学——地理对人类素质与历史的关系》(1822~1859,第二版)一书中,探讨自然现象与人文现象,把自然作为人文的基本原因,认为自然决定人类历史的发展。他应当被推为人文地理学的开创人。但他在某些方面把人地关系归从于神的意旨,陷入了唯心的“目的论”。

其后,对环绕人地关系观点的人文地理学理论,各家见解不一,但大致可以按出现的先后,依次归纳为环境决定论、二元论、或然论、适应论、人类生态、文化景观论等,以至今日的和谐论。

人文地理学概念的历史演变 大致可分为下列5种论点:

(一) 环境决定论(简称决定论)

环境决定论把自然环境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法国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在他的《论法的精神》(1748)一书中,强调了地区特征特别是气候对制定法律的影响。他说:“气候的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异常炎热的气候有损于人的力量和勇气,居住在炎热天气下的民族秉性懦弱,必然引导他们落到奴隶的地位……”。1881年英国历史学者H.T.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 1821~1862)在他的《英国文明的历史》(1857)一书中,专门论述了自然法则对社会组织和个人气质的影响,并把个人和民族特征归之于自然条件的效果。他说:“高大的山脉和广阔的平原(如在印度)使人产生一种过度的幻想和迷信”,“当自然形态较小而变化较多(如在希腊)时,就使人早期发展了理智”。他又说:“生活在极北纬度的人民从来不曾有过温带地区居民那样卓著的稳定的事业”,还进一步论证气候不仅刺激人或使人衰弱,也对人的工作与能力的坚定性产生影响。

德国地理学者F.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 1844~1904)被公认为环境决定论的倡导者。他深受当时C.R.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进化论的影响,在他的《人类地理学》(1882~1892)一书中,把人说成是环境的产物,认为人和生物一样,他的活动、发展和分布受环境的严格限制,环境“以盲目的残酷性统治着人类的命运”。他的学生E.C.森普尔(Ellen Churchill Semple, 1863~1932)把拉采尔这一思想传播到美国,广为宣扬并大加发挥。其后,美国地理学者E.亨丁顿(Ellsworth Huntington, 1876~1947)在他的《气候与文明》(1915)一书中,特别强调气候对人类文明的决定性作用。

拉采尔虽然论述了环境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也提出过“生存空间”这一概念,但他“是所有对人文地理学有贡献的人中最伟大的一位”(英R.迪金森语 Robert Dickinson, 1905~),也是第一个系统地说明文化景观概念的人。后人对他的决定论进行批判是完全正确的,但也不应当完全抹煞他对人文地理学的贡献。在1938年美国著名人类学家R.H.洛威(Robert Heinrich Lowie, 1883~1957)的《人类学理论史》一书中为拉采尔作过不平之鸣。他认为:“拉采尔没有夸大过自然环境的力量,实际上他曾一再告诫人们要提防这个陷阱……没有人曾比拉采尔更多地强调过历史的力量”。可见,对拉采尔的评价也不是完全一致的。

(二) 二元论(Dualism)

在洪堡和李特尔两位先驱逝世以后,地理学的一元性就受到了非议。洪堡曾主张地理学应

在复杂性中去理解统一性,李特尔认为统一性正是地理学的特点。但是,以德国 O. 佩舍尔(Oscar Pechel, 1826~1875)为首的一些人却反对李特尔的人文方向,认为地理学只能是对地球表面形态的研究,而人类活动则不在其研究范畴之内。这样,就出现了地理学上的二元论,连同 F. F. 李希霍芬(Ferdinand Freiberr von Richthofen, 1833~1905)和 A. 彭克(Albrecht Penck, 1858~1945)都把地理学限于自然地理方面,而摒弃了人文方向。

佩舍尔本人虽然主张把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局限于地表自然形态,然而他却写过一本关于人种学的书,讲述了人类的种族与风俗,但并未讨论人文现象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地理学的二元论者实际人数不多,时间亦不长。1942 年,英国地理学者 H. J. 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 1861~1947)就说过:“地理学成功的发展道路需要将它当作一门统一的科学,虽则它包括很复杂的现象”。1961 年苏联地理学者 B. A. 阿努钦(B. A. Анучин 1913~)批评了 30 年以来苏联地理学界分裂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的二元论,主张区域研究应谋求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间的联系与平衡,得到了许多学者如 Ю. Г. 萨乌式金(Ю. Г. Саушкин, 1911~)和 К. К. 马尔科夫(К. К. Марков, 1905~)等人的热烈赞同。1970 年,英国地理学者 C. A. 费谢尔(Charles A. Fisher, 1916~1981)著文号召恢复以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为主旨的区域地理学,并认为它是地理学的当然核心。1980 年在苏联地理学会代表大会上,马尔科夫发表了《现代地理学》一文,指出:“统一地理学或简称地理学,就是现代地理学”。二元论在地理学思想上虽不是长期的,普遍的,所占的地位也是不重要的,但它在中国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三) 或然论又称可能论

在拉采尔的决定论之后,德国出现了对二元论的反作用,法国则有许多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指责拉采尔忽视了社会因素。例如,人类学者 H. W. 马雷特(H. W. Marrett)认为拉采尔的概括性论断是“太漂亮了,但不真实”,因为人不能被自然之手所摆弄;人是一个理性的动物,具有一种社会传统,他的活动并不是直接由他的环境所决定的。

法国地理学先驱 P. 维达尔(Paul Vidal de la Blache, 1845~1918)既反对拉采尔的决定论,也不同意佩舍尔的二元论。在人地关系观点上另成一派,后人称之为或然论或可能论。维达尔认为地理学的目的是研究地面相关现象的因果;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除了环境的直接影响外,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人是一个积极的因素,不能用环境控制来解释一切人生事实。在他的《人文地理学原理》(1922)一书中说:“地质学和历史学之间的桥梁是由地理学架起来的。地理学为了交换它从其它科学得到的帮助所能贡献的共同财富不是去分裂自然所结合在一起的东西,而是去理解我们周围的地域环境或他们所处的地域环境中的事实的相应性和联系性”。维达尔把地理学的重心从自然转移到人这个积极力量,认为人类生活方式不完全是环境统治的产物,而是各种因素(社会的、历史的和心理的)的复合体。同样的环境可以伴以不同的生活方式。环境包括着许多可能性,它们的被利用完全取决于人类的选择能力。

维达尔的学生 J. 白吕纳(Jean Brunnes, 1869~1930)于 1907 年在洛桑大学开设了欧美各国第一个人文地理讲座,著有《人地学原理》(1925, 第三版)一书,以十分严谨的态度把人生地理事实分为三纲六目:即①地面上建设事业的不能生产者——房屋与道路;②动植物的利用事

业——耕种与畜牧；③经济上的破坏事业——动植物的滥杀滥伐和矿产的开掘。他在书中举了几个小区域作为例证来阐明人地相关原理的具体应用。在书的最后述及人种地理学、社会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各分支的研究目的与内容，并殿以《地学精神》一章，指出心理因素是地理事实的源泉，是人类与自然的媒介和一切行为的指导者。他说：“心理因素是随不同社会和时代而变迁的；人们可以按心理的动力在同一自然环境中不断创造出不同的人生事实来”。他认为：“自然是固定的，人文是无定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常随时代而变化”。

人文地理学者曼彻斯特大学教授 M. 费布雷(M. Febre, 1878~1956)把法国学派这些论点称为或然论。他有一句精采的结论：“没有必然的需要性，但到处有可能性，而人作为可能性的主人，才是利用可能性的主宰”。

(四) 适应论与生态论

法国学派的人地关系论在英国受到重视。利物浦大学教授 P. M. 罗士培(Percy M. Roxby, 1880~1947)创用了 Adjustment(协调)一词。他在 1930 年英国科协地理组年会的主席致辞中给人文地理学以新的概念、范畴和目的。在他看来，人文地理学包括两个方向：一是人群对他们的自然环境的适应，二是居住在一定区域内的人群及其和地理区域之间的关系。Adjustment 一词既意味着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限制，也意味着人类社会对环境的利用和可能的可能性。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地双方的相互关系，内容可分为 4 个主要部分：即人种地理学、社会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它们都是论述人类社会活动对环境的适应力的。历史地理学则是演变中的人文地理学。

与此同时，美国地理学者 H. H. 巴罗斯(Harlan H. Barrows, 1877~1960)却提出了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类的生态的观点。他在 1923 年美国地理学者协会会刊(Vol. 13, P. 1~14)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人类生态学》)，把地理学称为“人类生态学”。他主张地理学的目的不在于考察环境本身的特征与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而是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反应。人是中心论题，一切其它现象只是当它们涉及到人和它们的反应时才予以说明。他认为历史学研究人类在时间上的关系，地理学则侧重于分析人类在空间上的关系。他说：“在自然地理创立以后，一种使之人生化的坚决要求跟着就提出来了。这个要求得到了及时的反应，地理领域的中心从极端自然方面稳步转移到人文方面，直到越来越多的地理学者把他们的论题规定为完全论述人与自然和生物环境的相互影响”。

(五) 文化景观论

美国地理学者 C. O. 索尔(Carl O. Sauer, 1889~1975)于 1925 年就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地理系主任时，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景观的形态”一文。他承受了德国 O. 施吕特尔(Otto Schulz, 1872~1952)和 S. 帕萨格(Siegfried Passarge, 1867~1958)的思想影响，主张用实际观察地面景观来研究地理特征。他认为：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按地区联系的各种事物，包括自然事物和人文事物及其在各地区的差异的学科。索尔主张以解释文化景观作为人文地理的研究核心。景观一词把自然与人文兼容并蓄，体现了地理学的整体性。景观论在苏联受到重视；近年以来，苏联地理学者特别强调文化景观研究的重要性。

另一个美国地理学者 D. S. 惠特尔西(Derwent S. Whittlesey, 1890~1956)在同一时期提出过“人类占用说”,认为地理学不应是研究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而是要去描述和解释人类的居住空间,研究一个地区内人类社会占用的历史演变过程,并称此为“相继占用”。相继占用这一概念是环境决定论的对立面,它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决定论”;认为一个地区的居民在其态度、目标或技术上如有任何重大改变,则自然资源基础对他们的意义就得重新估价了。

理论与方法上的革新 从前述人文地理学思想演变的过程,可以看出,地理的统一性是思想主流,把地理学分裂为各不相关的自然与人文两个部门,以及把人文地理学排斥在地理学范畴之外,只是某一短暂时期内少数人的观点和做法,是不恰当的。

地球上,人类的每一个物质成就,不论是一间房屋、一个农庄或一个城镇,都代表着自然和人文因素的综合(李特尔语)。在组成地区特征的复合统一体中,自然和人文是不能分开的(A. 赫特纳语, Alfred Hettner, 1859~1941)。1913 年英国地理学者 A. J. 赫伯森(Andrew John Herbertson, 1865~1915)写道:“我们不可能将一个居住区及其居民分别考虑而不从整体中减去一个主要部分。……将整体分割为人及其自然环境是一个凶杀的行动。……这样分割之后,活的整体不再存在,而只是某种死的和不完整的残部了”。1922 年维达尔在他的《人文地理学原理》一书中总结说:“人文地理学因此不是一个排除人类的地理学的对立物。实际上,除了专业人员的心目之中以外,这种观点从来没有存在过”。1954 年,美国地理学者 P. E. 詹姆斯(Preston E. James, 1899~)认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区分,模糊了而不是澄清了地理学的真正性质”。在十月革命后的 30 至 50 年代,苏联地理学界曾有一部分人重新拾起了过时的二元论,把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截然分裂,并以经济地理学替代了人文地理学。可喜的是,这一情况现在已被纠正过来了。自 60 年代以后,在地理学的理论方面,自然与人文的统一性已在全世界再次得到确认。在人地关系上,已形成了人与环境间的“协调论”,从而奠定了现代地理学的统一性与综合性(“协调”一词英语为 Harmony,俄语为 Гармония,日语即为“和谐”)。

协调论主张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以谋求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间的和谐。它已成为人文地理学理论的一大革新。1961 年苏联的阿努钦在他的博士论文《地理学的理论问题》中,强烈地驳斥了存在着非人文的自然地理学和非自然的经济地理学的可能性,逐步恢复了地理学统一性的观点。1970 年,英国地理学者费谢尔在其《区域地理学往何处去?》(地理学 Vol. 54, pt. 4, 1970)一文中,也主张区域地理学应以分析人与环境为主旨。70 年代以来,分析并协调人和环境的关系已成为人文地理学的新课题。1980 年 8 月底在东京召开的第 24 届国际地理大会上,大会主席英国伦敦大学教授 M. J. 怀斯(Michael John Wise, 1918~)在开幕词中指出:“在今日世界人口日增,环境变化急剧,资源匮乏和自然灾害频仍的处境中,如何去协调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生活的关系,已成为国际地理学界所面临的主要研究任务”。1981 年 10 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议员人口和发展会议,也强调要协调自然资源和人口发展的关系。

除了地理学理论上的协调论以外,第二项变革是方法上革新,即所谓计量革命。1955 年,美国华盛顿大学地理系教授 W. L. 加里森(William L. Garrison 1924~)开设了一个研究班,用数学统计训练了一批地理学者。这个研究班毕业生英国的 P. 哈格特(Peter Haggett,

1933~)在1960年以后把计量方法引进了剑桥大学和布里斯托尔大学地理系,使地理现象分布的差异从定性进入了定量的阶段。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已能处理多种变量的复杂计算,使地理学有可能对一些空间规律的研究应用许多新的统计方法与技术手段,来进行精确的度量,并用数字来表达人地关系,说明区域差异与变化。计量革命引进了不少“模式”,在地理学中采用模式来探讨实际问题已日益广泛。英国的R.J.乔莱(R.J. Chorley, 1927~)和哈格特曾于1967年著有《地理学中的模式》一书以及D.哈维(David Harvey, 1935~)在1969年出版的《地理学中的解释》一书都是运用模式与计量的地理学新著。

他们指出,按照普通系统论的原则,一切系统具有共同的抽象特征,自然系统与经济系统具有同型性。物理学上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可用来说明经济系统中的信息输送;万有引力定律可用来说明城市间人口移动的趋势。在数学上,生物的生长曲线与散布曲线和经济发展曲线或人口增长曲线也极为相似;人口潜力与重力场有共同性;水力模型与运输模型可以互用;数学上的函数关系可取代文字上的因果说明;运筹学可用于位置分析;线性规划可用于解决交通运输问题;用回归分析方法可以确定两个以上相互依存的变量,从而创立了解决多因素问题的计算方法。数学模式既能说明自然规律,也完全可以用来说明农业、工业、运输、人口、城市等人文现象的相互关系与发展规律。

此外,卫星遥感等新技术在地理学及地图上的运用也正方兴未艾。

第三项变革是地理学的研究目的应如何结合实际关联运动。除计量革命外,人文地理学在论题内容方面也有所革新。过去,人文地理学以小区域研究,经济区划和文化景观类型为其主要论题,现已转到以分析解决各种现实的社会问题为其主攻方向。它涉及到国土整治、环境保护、贫穷与饥饿、种族歧视、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等问题的探讨。人文地理学论题的这种方向性转变,即所谓关联运动,有人称之为现代地理学上的理论革命。

1977年,英国D.M.史密斯(David Manshall Smith, 1936~)著《人文地理学》一书,作者在引言中阐明该书立意于估价各种地理情况下的人民生活水平,探讨各项政府决策对改善人民生活所起的作用。史密斯运用函数方法来分析“何人在何处获何物”的问题,即用人、物、地点三组变量列为矩阵,进行计算。其中“人”包括人口、居民阶层及其经济地位和种族、民族成份等变量。“物”指生活水平指标、营养指标和各种生活福利项目,“地点”则指各级经济收入水平或生活水平区的空间分布等。他把通过计算机分析所取得的数值制成生活质量分布图,来进行定量的描述和解释,然后进一步对生活质量加以评价,为生活水平偏低的居民区开出改善的处方,并实行改善的措施。以上这种以计量方法来分析生活水平的区域差异和改进人类生活为主旨的综合性区域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通常以都市为重点对象。他还探讨了三个实际问题,即世界高度发展、中度发展和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生活质量的地区性比较,南非的种族歧视和美国城市社会的福利三个问题。现代人文地理学还要求根据区位配置论、中心地学说和普通系统论等原理,在城市规划、道路建设、工农业布局、环境保护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上,进行空间分析与安排。这些工作可作为进行国土整治的参考。

以1980年8月底在东京召开的第24届国际地理大会为例,在人文地理方面,大会成立了经

济地理、人口地理、历史地理、城市地理和社会文化地理 5 个小组,共提出论文 255 篇(包括复兴区域地理小组),占大会全部论文(509 篇)的一半以上。并以日本文化、环境研究、自然灾害、气候变化与粮食生产、自然资源的利用与管理 5 个专题,进行了大会的报告与讨论。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地理科学结合社会实际的新趋向。

以上三项变革:人地关系上的统一性与协调论,研究方法上的计量革命与技术革新,以论题方式解决实际问题的关联运动,反映出今日的人文地理学面目已焕然一新,也为今后开展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三、人文地理学的主要内容

在人类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地球上几乎已经没有不受人活动影响的纯自然环境,作为人类生活环境的自然界已成为社会化了的自然界,人化了的自然界。这是人类的伟大胜利。但在另一方面,人类和环境所处的关系却往往不协调。人们不适当地开垦土地,滥伐森林,过度地放牧草原,造成了严重水土流失,引起了破坏生态平衡的恶果。此外,如不合理的灌溉引起土壤碱化,工业都市出现严重的三废污染等,也都是人类无视环境而受到的报复。如何协调人地关系,合理利用土地资源,“预防破坏景观,建设一个和谐的景观”(石田宽语,1919~)已成为现代人文地理工作者参加国家建设方面的新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自然地理各部门的研究,都有显著进展;在人文地理领域内则侧重于经济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各部门,结合生产实际,也取得较大成就;但却忽视并放弃了人文地理学其它各分支的研究。因为人类生活除了生产与消费等经济活动外,还包括文化生活、政治生活、文娱活动与心理活动等。近年来,又新兴了旅游地理等新学科,内容日益丰富。1976 年法国 M. 德洛教授(Max Derruau, 1920~)的《人文地理学》一书中把人文地理的内容分为人口地理、城市地理、农业地理、非农业活动(工业、渔业、服务业、旅游业、运输业)等。1977 年美国迈阿密大学教授 H. J. 德伯里(Harm J. De Blig, 1935~)也写了一本《人文地理学》,继承了西方人文地理学的传统,内容分为人口、文化、居民点、生活方式和政治五大章。现将人文地理学的主要分支的传统内容及其新动向分别介绍如下:

经济地理学 以叙述和解释人类经济活动的地域分布、人类生活资源的生产和消费、运输为其主要任务。传统的经济地理学曾记述各种物产,诸如小麦、棉花、金属和动力资源等的分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进行过各种经济区域的划分。经济地理又按不同部门分为农业地理、工业地理、交通运输地理等。在经济布局的理论上,德国学者曾有过杰出贡献,如 J. H. 屠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 1783~1850)的农业区位论(1826 年提出),A. 韦伯(Alfred Weber, 1868~1958)(1909 年提出)和 A. 廖什(August Lösch, 1906~1945)的工业区位论,W. 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 1893~1969)的中心地学说(创立于 1933 年)所引起的指导作用均已公认。现代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倾向已涉及到市场、政府决策、社会结构对经济布局的影响。对城市经济综合体的分析也十分重视。

自 1949 年以来, 中国经济地理方面成果卓著, 队伍亦具规模。经济地理的研究密切结合国家建设任务。除出版多种教科书外, 还进行了全国各地区的农业地理考察, 写出了不少调查报告。中国科学院曾主编过《中华地理志》的《经济地理丛书》(1956~1963) 和《中国农业地理总论》(1980) 及各省农业地理。农业区划目前仍然列为国家科研任务的首项。关于中国农业区划的理论与方法也在《地理学报》上发表过不少论著。《全国百万分之一土地利用图》亦正在编制中。在工业地理方面的工作则集中在安徽、山东的煤田, 河北、辽宁、湖南的钢铁业以及山东的石油区等。关于能源、交通线、工业城市和工业区的布局目前也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近年来, 世界各国如日本、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等都十分重视国土整治的问题, 并形成了一门称为国土经济学的新学科。中国对国土整治也开始重视。但整治国土必须对国土的自然和人文各方面首先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了解。不但要了解一个需要整治的地区(如黄土高原)的自然资源, 也要了解这个地区的社会、经济、民族、文化、市场与劳动力、居民生活水平与风俗习惯等情况, 然后才能对症下药, 作出正确的治理决策。

人口地理学 是研究人类居住在地球上的差异性。它的内容包括人口增长、人口数字、人口分布与密度、人口迁移、人口部门结构和人口问题等。法国人口地理学者 B. 奎尼尔(Beaujeur Quarnier)认为: “人口地理学是描述现在地理环境条件下人口的事实和状况, 分析构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及其发展趋势, 进一步将世界人口分布、人类社会的演进和人类成就的程度加以深入的研究。1970 年美国宾州大学地理系教授 W. 齐林斯基(Wilbur Zelinski, 1921~)把人口地理的研究分成三个方面, 即描述人口分布的特点, 分析人口分布及空间上的表现形态以及分析造成这种形态和特征的相关因素。齐林斯基着重指出了世界人口不断增长、工业生产不断发展的严重后果, 认为这种人口增长综合症的出现将成为 21 世纪人类的隐忧。如何使一国的经济发展与其人口增长相协调, 如何控制人口的无限度增长, 根据自然资源的开发可能和经济技术条件的水平, 保持一个地区的适度人口, 已成为人口地理学者的新课题。近年来, 中国对人口问题十分重视; 一面大力从事经济建设, 一面严格节制生育, 以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 已成为重要的国策。

城市地理学 城市是一种特殊的区域, 居民集中, 房屋街道的结构与城市的功能也具有各种特征。城市往往是一国一区的政治、经济中心。现今世界城市人口比重日益增高, 许多国家已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城市地理已成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新的分支。研究城市一般从分析其地理条件, 追溯其历史发展起源开始, 主要内容应包括城市的形成与成长过程、城市的功能与特征, 城市的空间结构、社会组织及其贸易腹地范围、城市的人口与民族构成, 城市的类型与规划等。欧洲和日本的传统是研究城市的形态(布局和建筑物), 美国则较多注意于城市社会、商业、服务业和工业的空间变化模式等方面, 例如商业及服务业的结构、城市社会系统的类型, 黑人、犹太人及其他移民区的形成以及城市内外人群的迁移等课题。许多新的计量技术最先应用到城市地理学的研究, 它在地理学中应用数学模式亦最早最多。在社会主义国家内, 城市地理学者按国家的政策参加规划工作尤为重要。中国的城市政策以控制大城市, 发展中、小城市为方针, 并根据城市的不同功能来规划其空间结构。

政治地理学 领土、国民和政权是国家三大要素。政治地理学者通过研究国民与领土的关系来分析政治现象的地域体系。政治地理学(包括地缘政治 Geopolitik)一度曾是人文地理学中最活跃的一个分支。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德国的拉采尔,瑞典的 R. 克伦(Rudolf Kjellen, 1846~1922),英国的麦金德和美国的 I. 鲍曼(Isaiah Bowman, 1878~1950)曾对全球战略和地缘政治发表过论述:如拉采尔的国家有机说和生存空间论,麦金德的大陆腹地论,鲍曼的民族自决论等。荷兰地理学者 S. V. 范根堡(Samuel Van Valkenburg, 1891~1976)曾于 1939 年著《政治地理学》一书,提出过所谓国运轮回说。到了 30 年代后期,这些论说被纳粹德国御用学者 K. 豪斯浩佛(Karl Haushofer, 1869~1946)歪曲利用来为他们法西斯侵略政策服务,从而地缘政治一词遭受到后代地理学者的摒弃和谴责。

政治地理学在今日应与政治学和历史学配合,除研究国家和地区外,也注意到以政治、军事、经济和宗教为背景的各种国家集团如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和欧洲共同市场、华沙条约国和经互会、东南亚联盟、非洲统一组织、不结盟国家组织、阿拉伯联盟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等。它们在保卫世界和平、国际互助的名义下,以超国家的力量相互角逐。

政治疆界的分析及其改变曾引起不少人的注意。政治区域的演变、结构和功能也是如此。现代分析技术及模式的应用已引导人们去测定各类各级政治区域的效率和效果。近年来,西方各国地理学者对政治行为和政府决策的地理背景具有新的兴趣。例如,政治地理学者研究了国土整治的决策、首都的定位、大都市区的结构、国家公园的设置、选票模式地域分布以及诸如领海界线和沿海捕鱼权等课题。

社会文化地理学 简称社会地理学,亦即狭义的人文地理学。它研究各种不同社会类型的区域分布,分析比较其间的相互关系。社会类型如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等起源于特定的生活方式,它们是对不同自然环境的一种直接反映。社会地理学在探讨人地关系中重视人口、民族、宗教、语言等社会文化条件,强调社会因素对地区文化的影响。这些传统仍然重要,并且由于应用了更为先进的制图与计量方法而有所创新。社会地理学的另一内容是在各种社会因素下的聚落的分布与型式。近年来,由于人口向城市集中,原属社会地理学内容之一的城市地理已独立成为一支学科。在美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的方向已转到种族问题(黑人、犹太人、印第安人等)、社会各阶层的冲突问题、贫富不均与犯罪等社会问题的探讨,对这些社会文化现象的发生与发展加以分析。例如,在瑞典地理学者 T. 哈格斯特朗(Torsten Hägerstrand, 1916~)的影响下,特别注意于特定过程与现象的决策和地区行动模式的分布。在苏联,社会地理学也日益被重视,萨乌式金主张:“经济和社会地理学应建立在深入研究自然——技术——经济——社会生活链的相互基础上,并极力推动地理学的社会化。”

历史地理学 很早就成为地理学的一门独立分支,以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为主要研究对象。历史地理学者的任务,不仅要研究政区建置的沿革,并且要复原历史时期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不仅要研究一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地理演变,并且要探索这种演变的规律性。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开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其中如英国、美国、日本和苏联等,均在这方面作出较大贡献。

中国拥有大量的历史地理文献,历史地理学者利用这些丰富资料,进行沿革地理的研究,已有悠久历史。1949年以来,又通过历史文献的分析和野外实地考察从事研究,在此基础上,编写出版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和《中国历史地图集》(1974)等。近年来,已开始应用诸如孢粉分析、放射性碳素年代测定、航空和航天照片判读等新的科学技术方法。今后,在继承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加强新的科学技术方法的应用,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者的重要任务。

人文地理学的其他分支 有旅游地理、聚落地理、感应地理、行为地理与生态地理等。旅游地理研究旅游资源、地点、路线、季节与内容等,是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大有发展前途。聚落地理比较古老,探讨聚落的起源、成长与发展,与人口和城市地理关系较密。感应地理与行为地理学是地理学与心理学间新兴的边缘科学,它研究不同地区人类行为的心理差异与分布、行为的环境系统、人类生活对环境的感应以及环境与人类行为的关系等。目前已能根据调查资料,应用新技术编制出各种社会集团的意境地图(mental maps)。人们对环境发生感应后,作出判断,考虑如何去适应或改造环境,以达到人与环境相协调的目的,这是行为地理学的研究任务。这一学科在70年代以后才开始兴起。

四、如何开展我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

随同国家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发表,1981年12月1日赵紫阳总理在全国人大五届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各级学校都要加强中国历史和地理的教育,这是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从1981年起,凡已改为六年制的我国中学均在高中开地理课,并以说明人和环境的关系作为基本内容。小学也恢复了地理课。在六五计划中要求我们加强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面对目前我国人文地理学科人少事多的局面,我们应该怎样来响应国家的号召呢?

通过地理教育不仅在各学校内能向青年进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它对国家的四化建设特别是有关国民经济的运行与布局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例如,发展农业经济就需要根据各地的自然环境(包括土地、水热、生物等资源)和社会条件(如经济基础结构、人口与劳动力、民族风习、文化特征、耕作制度与历史背景等)来因地制宜地利用土地,实行合理的有效的区域分工和一定程度的专业化,以求扬长避短,发挥地区优势。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环境的质量差异很大;我国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地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与技术水平也不相同;这就要求我们对各地的人地关系进行具体分析,除了调查考察各地区的自然环境外,还要分析各地的人文地理特征,然后才能建立人类不把自然当作敌人而是和自然交朋友的和谐关系,以加速四化建设,让青年干部理解这些道理,在他们的工作中就会起到良好的作用。

在1984年3月于南京召开的中国地理学会第一次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上,我曾引用过陈云同志对文艺界的讲话里所提出的“出人”、“出书”、“走正路”的三点指示,认为这三点指示也可作为今后我国人文地理学界工作所应遵循的方向。首先是“出人”的问题。要大力开展已被抛弃了三十五年的人文地理学的研究,目前最严重的是缺人的问题。不少青年地理学者几乎连什么是